



# 享受不能无止境

自从清朝的一些人和事被编成故事,搬上银幕和荧屏以来,有几个鲜活的人物,逐渐被观众所熟悉。其中一个叫和珅的大臣,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。加上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,历史离现代人近了许多,北京城内有许多当时的建筑又保存得完好无损,使现代人能更多地了解历史留下的物证。和珅建造的“银銮殿”,便成了旅游参观者当选之地。所以,和珅的传说,有了这座“银銮殿”,一切都变得真实可信。

据史书记载,和珅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,他不仅长得像模像样,还有着一肚子墨水。经常在皇帝面前卖弄文采,且能出口成章,旁征博引,博得了皇帝的赏识。他不仅文采出众,溜须拍马,察言观色的本事也堪称一流。所以,他要模样有模样,要文才有文才,要玲珑有玲珑。可以说,在封建官场上,官员该有的和珅已全部具备,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,因而他的官位不停地往上升,一直升到皇帝身边,成了朝中要员,皇帝的重臣。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,能走到这一步,已经是登顶了,和珅应当知足了。当时的满朝文臣中,才学超过和珅的人,不是一个,而是一批人,像纪晓岚、刘墉这样重量级的能人,论学识都比和珅胜一筹,但他们在阿谀逢迎、溜须拍马方面,却大大不如和珅,再加上和珅又是地地道道的满族人,同皇帝又能绕上族源,得到皇帝的重用也在情理之中。可

人家和珅,从来不与那些与自己地位相当或低下的人相比较,他两只眼睛只盯着皇帝,真可谓眼珠围着龙体转,屁股就开始惦记龙椅了。他胆子越来越大,竟然要与皇帝比肩,虽然没有奢望坐在龙椅上当皇帝(至于他的思想深处到底想没想,他没有自述,我也没去找这方面的资料),但从当时的翅膀硬度来看,还不具备做皇帝梦的条件。可这个和珅说他聪明,他确实有过人之处。既然要与皇帝比肩,龙椅不会有两把,但过过皇帝的的生活,享受皇帝般的物质待遇,与当上皇帝没有多大差别。或许和珅认为,人生不就是享受吗?今朝有酒今朝醉,快乐一时是一时,和珅似乎悟透了人生真谛。于是,坐轿超规定,住房超规定,纳妾超规定。只要他的事,都要来个“破格”。因为他要享受的是皇帝的标准,超出清政府的规定是很正常的事。不超出,怎么能叫皇帝待遇,不超出又怎么能区别于众官僚。和珅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,不怕别人揭发,不怕别人告御状,主要是看准了他与皇帝的关系,只要皇帝不知底细,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他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,用不着提心吊胆。和珅就这样,明目张胆地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。皇帝住在金銮殿,他就要仿照金銮殿建造一座“银銮殿”,你看和珅是多么地有创造性!“银銮殿”的建成,确确实实填补了中国封建时代官吏所住府邸的空白,和珅确

实太有才了。但和珅没有想到的是,公款消费,那都是有规定的,花国家的钱可不能大手大脚,尤其是在为自己建安乐窝时,更要按规定办事,不能假公济私,也不能以权谋私。超标建房,就是缴纳房租也是违规,如果变成个人财产,那应当在犯罪之列。不是有人说,房子再大,自己只能用一张床。“银銮殿”虽然壮观,和珅也只能用一张床。至多让和珅看看此建筑,捋着胡须,恣悠悠那么一刹那,合此,还有什么呢!

和珅没有想到的是,人也有个自然规律,生老病死,那是谁也难以抗衡的。老皇帝乾隆死了,和珅的后台也轰然倒塌。这样,身居高位、颐指气使的和珅,罄竹难书的劣迹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。当年一些看不惯和珅的官员站出来了,用清王朝对官员生活待遇的规定来衡量和珅的所作所为,用和珅的欺世盗名、滥用职权来讨伐和珅的罪责,和珅超出级别的享受,引来了祸水,他已经处在引颈受戮的境地。这时的和珅,讲颜面没人看,讲才能没人听,讲宗族关系更没人理会。看来,人一旦做了违规违法的事,一旦这些事败露或被揭穿,原先的一切优势,诸如权利啊、关系网啊,甚至亲情啊,都变得软弱无力。权利可以免除,关系网那就更靠不住了,在那个“有奶便是娘”的时代,关系网顷刻间便会网破,网上的人也会根据情节轻重、或绳之以法,或降职使用,或削职为

民。这时的关系网正好为正义力量网尽那罪恶创造了条件,要不怎么叫一网打尽呢?和珅终于没有逃出法网,他与皇帝比享受的结果,是家被抄,金银财宝和那“银銮殿”被朝廷没收,和珅被皇帝赐死,甚嚣尘上的和珅,落得个悲惨的下场。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,可谓至理名言。

聪明的和珅,朝廷中的风风雨雨他经历了很多很多,都被他那过人的招数和多端的诡计化险为夷。也就是说,对于意想不到的难题,他能应对自如,变被动为主动,而对于大家都明白的事,他也了如指掌,却都不放在心上,即使对朝廷的明文规定,只要不符合自己的胃口,他也不在乎,依然我行我素。规定就是标准,大有大的规矩,小有小的标准。这样,社会才能有序,事业才能有一定的轨道上前行,不至于为所欲为,无所遵循。和珅却对这样常识性的东西不屑一顾,恣意妄为。他公然藐视朝廷的规定,住房超标,坐轿超标,纳妾超标,佣人超标。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凌驾于王法之上,跌跤那也是迟早的事。圣人孔子对违反鲁国规定的大臣,曾毫不留情地说:“八佾舞于庭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!”看看两千多年前孔子对多了几个跳舞的人,都大发雷霆,因为此事发生在礼仪之邦,讲的就是规矩,八队人跳舞,只有周王这一最高级别才允许,其他臣僚只能按职务大小层层缩减。那个时代规定得都那么严格,可见,规矩对一个等级森严的

国家是多么重要。和珅是个读书人,孔子的话不仅读了,凭他的记忆力,应当是耳熟能详,不知道为什么,他并不认真想一想。可能是过于陶醉自己的官位,过于陶醉于皇上对自己的好感,他也太自大了。或许,他看着超标准的住房顺眼,体验与皇帝一样的享受自在,他也太显摆了。须知,王法早已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了,只是时间来早与来迟。所以,为官者还是要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,按标准要求生活,千万不要越过规定的线,一旦越过,查出那是迟早的事。即使暂时没人过问,住在超标准的大屋里,恐怕也睡不踏实,乘坐超标准的交通工具,恐怕心里也是忐忑不安,如果提心吊胆地生活,那不如说是人生的一种折磨,这又何苦呢?正如老子所说:“甚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。”
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和珅的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点。推而广之,从古到今,大到一个朝廷,一个国家,小到一个州府,无不有“宠臣”的身影在晃来晃去。当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下风光无限的时候,却不知道已经站在了万丈深渊的边上,还陶醉于自己的得意。岂不知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主子手里,主子就是那悬崖边上的大树,这棵大树如果有一天连根拔起,那么最先粉身碎骨的就是背靠大树乘凉的人。这就是“宠臣”的命运走向。所以,为官者要牢记,规范有界限,越过界线很危险;道德有底线,底线以内很安全。

# 管好身边人

从史书上看到,齐国相国晏子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工作人员,他的职责是给晏子驾车,史上没记载他的名字,只称他为车夫。能给齐国相国驾车,在这位车夫看来,是十分荣耀的工作,与其他车夫相比较,自己又不知高出多少倍。相国的车夫,因为服务的主子是高官,自我感觉似乎也飙升了。于是,他不是认真去对待工作,而是在努力表现自己。晏子没有发现车夫的异常,可车夫的妻子却深有感受。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材料,但略加分析,即可得知车夫肯定是在妻子面前有异样的表现,或说话的腔调有变化,或走路的姿势与过去不同。不然,他的妻子不会窥视他驾车时的神态。一次,车夫为晏子驾车,妻子躲在暗处观察车夫的一举一动,果然是做气得很。只见他昂首挺身,高高地坐在车上,头顶上还遮着大伞。这位车夫本来身材就高大,又这么装模作样,使那本来就矮小的相国晏子,显得更加矮小。似乎车里应该坐的不是相国,而是这位车夫。

车夫虽然处在极度的陶醉中,可

晏子是坐在车上思考齐国的大事,没有对车夫指点一二。车夫的妻子对此事却认真起来,对陶醉中的车夫击了一猛掌。当这位车夫回到家里时,妻子便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。车夫自我感觉良好,也没有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,便以诧异的眼神看着妻子,等待妻子陈述理由。于是,妻子将车夫自从为相国驾车后的表现一一说给丈夫听。车夫妻子说,人家晏子身材矮小,身居相国之位,其名声显赫于诸侯,作为一介车夫,理应把车驾好,没有理由去表现自己。为相国驾车是车夫,为他人驾车同样也是车夫,本来吃的就是驾车的饭,没有什么值得神气的,更没有必要去装模作样,故意卖弄。这样的离婚理由可能只有车夫的妻子才能提出,不仅让车夫服气,就是现代人看了,也会由衷地佩服这位家庭妇女的洞察力。这位车夫的妻子应当在中国妇女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。虽然只是车夫的家属,其眼光、其境界却不是一般的人能与之相比的。这是位真正的贤内助,更是一位“廉内助”,其见识非同

一般。陶醉的车夫被爱妻的一席话猛然惊醒过来,从此,他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,明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,更懂得了如何做人处事了。

这位车夫,只是在为相国驾车的过程中突出了一下自己的高傲,虽然有点狐假虎威的表现,但还没有打着晏相国的旗号为自己或他人办私事。如果说这位车夫有异常的话,那只是刚刚处在萌芽状态便被贤妻发现,进行耐心说教,使车夫幡然醒悟。假如他妻子听之任之,或者是全力支持,车夫就有可能做出更多利己害人的事来。如,打着晏子相国的旗号,将自己的亲戚朋友调进齐国有关部门工作,或者为别人的升迁提供些帮助,或为强取豪夺的人打赢无理的官司,或在齐都城内的黄金地段开个店铺,经营“齐纨鲁缟”,诸如此类的事情车夫都没有去做,也没有来得及去做,便被妻子的良言制止住,不仅使他再没有不良表现,反而使他变得谦虚谨慎,所作所为都与车夫的角色一致。但是,这样的妻子,别说在两千年前难以找到,即使在现代社会

也是不多见的。

官多大奴多大,王府的奴才还是七品官。这是封建时代老百姓对那些在官员身边工作人员的看法。这不是说身在官位的主人有多么大的权力,而是说为官员服务的奴才,是多么的神气。在那个时代,高官身边的工作人员,一般都把自己视为主人的替身,主人的地位有多高,工作人员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多高的位子上,说话处事,俨然就是个高官。久而久之,这一种人便成了官场滋生出的异类,他们往往打着为官者的旗号,责令下属办这办那,作为下属并不了解那要办的事情,是出自为官者之口,还是出自工作人员之口,不便问也不敢问,长此以往,这帮人便成了不能轻易怠慢的上司,人称“二把手”或“影子主人”。主人的形象逐渐被这些人败坏。为官者的形象越糟,威信越下降,这部分人的作用越大。因为,一批巴结为官者的下属渐渐都向这部分人靠拢。既然买官的买到了,违法的没事了,如此说来靠上他们,就等于进了官帽厂,任其挑

选;靠上他们就等于找到了保护伞,任其胡作非为。历史上不少朝代的朝政被宦官把持,致使天下大乱,最终造成国破家亡,就是因为皇上被身边工作人员毁坏了声誉,破坏了朝纲,使奸佞得宠,忠臣失势,危害可谓大矣!清朝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,就是典型的代表。遗憾的是,在那长达几千年的人治社会里,这部分人总有市场。而且,不管名称改得怎么动听,只要为官者身边需要工作人员,就有像车夫这样的人,更有像李莲英那样的人。

看来,如何使用这部分人,管好这部分人,是当权者不可忽视的大问题。但愿历史不再重演,但愿更多的工作人员能像车夫的妻子那样明白。

“身边人”,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为官者的政治命运。作为高官,必须时时警惕被自己的家人、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“打倒”、“绑架”。而要不被打倒,则需要做到:恋亲不为亲徇私,念旧不为旧谋利,攀亲不为亲撑腰。为官者对此应保持清醒。

# 画蛇添足之想

北魏时期,有个叫古弼的尚书令,因为他敢于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较真,后来的《资治通鉴》为他记下了光彩的一笔,称他为人敢于向帝王提出批评意见的人,是记于下帝王的格言——“为国远虑,虽死何伤!”

仔细翻阅史料,主要的就是太武帝拓跋焘打猎的事。因在狩猎中,太武帝发现自己带的马匹不能适应狩猎的需要,于是给古弼发了指令,让他把能跑能奔的好马送到猎场。按常规,帝王的指令必须是百分之百地执行,不允许打半点折扣的,可这个古弼恰恰来了个软磨硬扛,不仅不挑精壮的马,反而“悉以弱者给之”,就是把那退役的弱马送给了拓跋焘。正在狩猎兴头上的太武帝,等候的是良骥,以扬威猎场,享受逐猎之乐,看到送来的弩马,怎能不暴跳如雷?古弼头颅上尖下圆,像毛笔的笔尖,太武帝给他取绰号叫“笔头”,生气时叫他“尖头奴”。当时,在气头上的太武帝大骂要“先斩此奴”。在皇帝即国家的封建时代,古弼的行为已构成了欺君之罪,实属“杀无赦”之列,而这个罪

完全是古弼自己有意违犯的。帝王的指令非常清楚,要的就是好马,难道古弼连好马都不知道吗?他是明知故犯。因为那个时代,主要靠的是人力、马力,拥有了大量好马,意味着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优势。马力既是经济实力,又是军事实力。打猎靠好马追逐猎物,打仗靠好马追杀敌人。古弼正是基于对马的作用的认识,才敢于同“一把手”对着干。所以,当拓跋焘的“雷语”从狩猎场上传回来时,古弼身边的人都吓破了胆,唯有古弼泰然自若。他对下属的官员说:“我为人臣,不让皇上迷恋游猎,如果有罪过的话,我想这个罪也是我的;如果朝廷不能做到有备无患,使国家缺乏国防所需,这个罪才是大的。现在北边有强国骚扰我国边境,我想把肥壮的马留给军队使用,挑选老弱的瘦马给皇上打猎,这是为国家安危而深谋远虑。即使为此死了,又有何妨?再说,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,责任在我,要死也是我去死,大家用不着忧虑了。”已经把自己为何违抗太武帝的指令,说得清清楚楚。

正像史书所称道的,古弼不怕得罪皇帝,他在“为国远虑”。可我觉得古弼过于陶醉于自己的美好愿望,似乎为北魏,只有他古弼才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利益着想。我觉得这倒是古弼借机为自己自编自导了一幕“秀”剧。拓跋焘作为皇帝,是北魏的一把手,又是历史上出类拔萃的帝王,有勇有谋,治国有方。古弼作为尚书令,整天在皇帝身边工作,对皇帝的能力、人品了解得最多,知道得也最多。况且拓跋焘并非玩物丧志之人,北魏版图的扩大和政权的巩固,在位二十九年的拓跋焘起了决定作用,可称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。古弼所处的这个时期,正是北魏最为强盛的时期。如果不是古弼有意作秀,即使把最好的马送给拓跋焘狩猎,也不会影响到军备。狩猎能用几匹马?狩猎又能狩几天?不用说北魏那时的势力强大,就是处于一般的国力,皇帝用几匹马狩猎也用不着如此小题大做。打完猎后,马不是照常用来保家卫国吗?正是因为古弼要借太武帝调换好马指令的机会,自编自导以瘦马代壮

马的“作秀”之剧,才能使他说出那样让皇帝和史上文人感动的“道白”来。试想,如果不利用这样的机会,古弼到哪里去述说自己的衷肠呢?拓跋焘被蒙了,史书的撰稿人也被他蒙了。拓跋焘最终不仅没有怪罪古弼,还对其言行大加赞赏道:“有臣如此,国之宝也!”随即“赐衣一袭,马二匹,鹿十头”。看看古弼这个“秀”作得是多么有价值。

如果说古弼有意作秀是冤屈了他,那么,我们不妨再晒一晒他的忠心。按他的说法,他是在“为国远虑”,而拓跋焘执政的那个时代,最值得远虑的并不是边境的安危,而是世家大族势力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。他们在地方上有着特殊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,形成了所谓的宗自豪强,与北魏政权相抗衡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拓跋焘去世,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,才引起朝廷的重视。如果古弼真正有远虑,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为太武帝出点好主意,况且这些宗自豪强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,又恰恰出在这个时期。当然了,我们无法苛求古人,但我

们也不能被历史上这些善于作秀的官僚们所蒙蔽。写到这里,此事似乎是拓跋焘与古弼两人在演“双簧”,作为一世英明的拓跋焘,不可能看不出古弼是在“作秀”。但恰如燕昭王重金买千里马枯骨的故事一样,拓跋焘嘉奖古弼的意图,其中大有深意:招贤纳谏,非令主而何?古弼作秀是个小“秀”,而让拓跋焘借机作了一把大“秀”。为国远虑的人首先应当是一国之君,国君没有远虑,那国必有近忧。作为国之臣子,应当做好的是自己的本职工作,而不是两只眼盯着帝王的一言一行。这或许就是古人的思维定势,似乎只有从皇帝那里找点缘由,才能引起史官的注意,从而与青史结缘,留下美名。古弼在这方面称得上有识之士。怪不得史学家们把古弼捧上了天,说他敢于与皇帝较真,那是需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和胆略的。

由此不得不同:千秋功过该由谁来评说?是史官还是众多后来人?这正是自古至今的一个难题,一个无休止地争来论去的话题。